

■新作 推介

《群众的时代》:

从社区角度解读城市基层治理

违建房、乱停车、种菜忙,小区管理之困如何破解?老旧小区改造的困境与出路在哪里?如何破解高空抛物的治理难题?诸多因城市居住空间引发的问题,对普通市民而言,可谓既熟悉且难解。在《群众的时代——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基层治理》一书中,武汉大学社会学学院副教授、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德福从“社区”的视角,对城市基层治理的难题进行了梳理和解答。

“社区”是一个社会学概念,最早是一个德语词汇,本义是“共同体”的意思,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将其翻译为“社区”。2000年,全国推进社区建设,将这一社会学概念作为新的基层治理单元的名称。社区的成员即生活在“附近”的群众,同为生活秩序中的“共同体”。“共同体”之间较为理想的局面,大体是彼此的关系不会很亲密、熟悉,但也不至于陌生、冷漠,在遇到困难的时候,社区里的人能够互助合作,形成良好的社群生活秩序。

然而高楼大厦水泥森林里的都市人,普遍感受到的是生存的原子化、个体化,即便是邻居,“纵使相逢亦不识”的情形比比皆是。这些现象用牛津大学人类学者项颀的话说是“附近”正在消失;我们的“附近”正在从自己、家人、朋友,被科技、机器、便捷服务取代。随之而来的,是人际关系的松散、不信任,甚至冷漠。

《古人的日常生活·把玩》:

介绍传承千年的把玩艺术和把玩之道

古人有一种生活的艺术叫“把玩”,意思是将一种物件握在手中赏玩。古人通过用手指和手掌反复触摸物件,欣赏其形状,感知其内涵。这其中的乐趣,只有亲自上手把玩才能有所感悟。作家吕佳《古人的日常生活·把玩》一书,全面介绍了中国传承千年的把玩艺术。

谈及把玩,不能不提各式各样的“把玩件”,这是文玩界的一个专有名词,主要是指那些可供人握在手中把玩的小物件。把玩件的涵盖面极为广泛,从最初的骨器装饰物,到书室中的文房清玩,再到自然界中的花鸟鱼虫;可谓“万物皆可把玩”。算得上大类且有文化底蕴的,作者大体提炼为四类:骨器项链、玉雕玉器、文房清玩、佛珠手串。每一大类后面,都体现出古人在把玩中不同的追求。

具体说来,骨器项链体现了古人对美的追求。在石器时代,原始人类制造的各种石器、骨器、角器,从最初满足生产生活的必需之用,发展到满足对美的追求。那些被精心打磨的光滑小石珠和被藤条串联的钻孔骨器项链,在当时可以说是最为豪华的饰品。作者认为,正是出于对美的追求,远古先民无意识地开启了把玩,然后是有意识地寻找其他方面的把玩器物。

骨器之后,玉器是最受古人追捧的把玩件了,这既有追求美、欣

怎么办?《群众的时代》作者王德福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深入调研近20个省市、100个城乡社区,他的观点是,从群众入手,把群众组织起来。具体说来,便是从“人”与“事”两方面下功夫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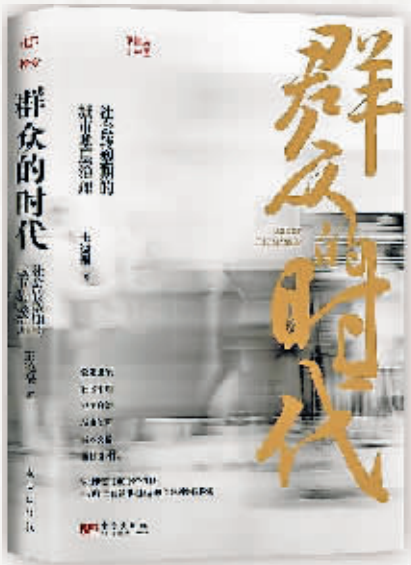
首先,让一部分人先相互熟悉起来,重建生活中的“附近”。首要是要识别出关键群体,这一关键群体包括公职人员群体、在职党员、居民领袖等。公职人员群体、在职党员可以称为体制性社会资本,这一群体通过体制内自我动员,可以形成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。目前,许多城市都推出了在职党员双报到政策,这为激活体制内社会资本提供了制度保障。过去三年,公职人员群体、在职党员的就地下沉,不仅帮基层社区渡过了难关,更有效实现了公职人员、在职党员的社区化。因此,激活公职人员、在职党员实现身份社区化的关键是将其特长与治理需求结合起来,充分发挥这些宝贵的人力资源,比如参与业委会、做楼栋长、充当积极分子等,带动身边的群众重建生活中的“附近”。除了在职党员这一关键群体之外,活跃于社区中的一些居民社会组织领袖也是社区治理的关键力量。

其次,三事分流,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。所谓“三事分流”,就是划分社区事务中的大事、小事和私事的责任归属。大事归政府,小事靠居民合作,私事则属于居

民自助。

作者认为,三事分流的实现有两个关键,一是事务分类,二是分类后的事务能够办成和办好。二者不是割裂的;科学合理的分类,是办成事和办好事的前提。分类清晰才能明确责任主体,尤其是明确政府和社区的责任边界,明确各自在不同类型的事务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,发挥多大作用;能够把事情办成和办好则是实现分类的基础,只有把事情办成、办好,居民才能认同和接受分类,如果办不成或者办不好,政府单方面的分类是没有意义的。因此,分类是基础,但不是决定性的,把事情办成和办好才是决定性的。

对城市基层治理中的诸多方面,该书按照议题分为六个部分,即党建引领、社区治理、业主自治、城市治理、城乡交错、对话“新社群时代”。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,一是对社区治理的最新基层实践的呈现,如党建引领、社会治理共同体、治理下沉等;二是提出了若干具有原创性的思考,如社区性公德、人格化自治、新社群生活等。如党建引领部分关注了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最重要的创新实践,探讨了基层党建如何与陌生人社会相融合,党建如何转化为治理绩效等问题;社区治理部分关注城市基层若干重要治理现象和地方实践,比如治理下沉、三事分流、文明城市创建等,提出了社区性公德、人格化自治等创新性思考;城乡交错部分则聚焦



都市与乡村结合和过渡地带这一特殊社会地理空间的若干问题,探讨了城乡交错地带的治理特点,并对当前各地正在推进的郊区新城问题阐述了看法。

总而言之,把群众组织起来,本质是在新时期找回党的群众路线,扎根基层组织社会,提高基层组织社会的能力。让群众做群众的工作,让群众解决群众的问题,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、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才成为可能。这样一来,破解社区治理难题,攻克城市基层治理的“最后一公里”,便是水到渠成的事。

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文 / 图



法的研究颇为详尽,从材料选择到工艺制作都秉承极高要求;书稿第四部分挑选了一些古代的把玩名家,通过介绍他们与文玩物件之间的故事,为读者呈现各类文玩物件中所寄寓的文化内涵,这正是那些传承至今的精品文玩物件的生命力所在。

当然,把玩艺术很容易陷入“玩物丧志”的境地。古人对此是有所警惕的,故而特别看重“把玩之道”:“以物养心”而又“不为物役”。古人对物件的把玩更多追求精神上的享受,这与一些现代玩家追求提升文玩价值的目的有所不同。在把玩过程中,通过对物件的操控与欣赏,让身心更为充实,让精神境界得到提升,这才是古人追求的把玩之道。

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文 / 图

■新作 述评

《愿将此生长报国》:

感受科学家的家国情怀

浙江教育出版社推出的《愿将此生长报国》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集,共收录5位作者的5篇作品。该书聚焦获得“时代楷模”荣誉称号的院士群体,展现他们的人生经历、事业成就、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。读此书,仿佛上了一堂又一堂带有科普性质的“专业课”、蕴含哲理意味的“人生课”、具有引领作用的“思政课”。

书中的5位院士,分别是植物病理学专家朱有勇、雷达专家刘永坦、水稻遗传学家卢永根、炼油工程技术专家陈俊武和核动力专家彭士禄。从身份看,5位传主是“时代楷模”,是院士,这是“形”的部分。而他们情之所牵,心中所向,都浓缩在书名的“报国”二字上,这是“神”的范畴,是人物形象的本质属性。也可以说,他们都在创造着、实践着“科学家精神”。

全书厚植家国情怀。5位主人公都是在“时”与“势”遭遇巨大困境的背景下,自觉将人生目标和生命追求,与民族、国家、时代紧密关联起来。比如,刘永坦出生于1936年,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之时。他是在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轰炸声中成长的。所见所闻所感,让他立下“做一个有担当的中国人”的誓言。卢永根1930年出生于香港,逃难中的饥饿感坚定了他日后投身农业、扑向大地的决心。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强大而深沉的信念感,以果敢和不屈直面困难、迎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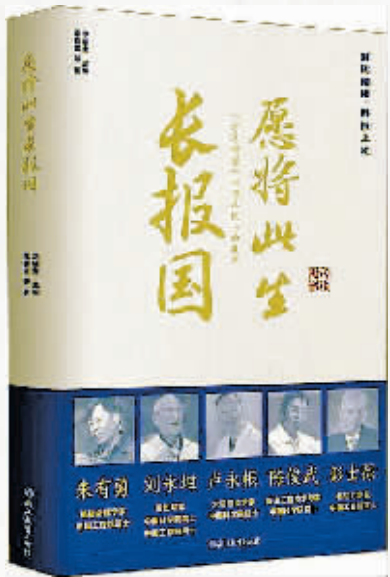
风浪,又能甘坐冷板凳、潜心研究,力求“知行合一”,不断锤炼“择一事终一生”的专注品格。

知人论世是该书的一大写作特点,几位作者有意或无意突出“父亲”角色,强调“血缘”和“地缘”对一个人成长成才的重要影响。陈俊武学习英语碰到困难,失声痛哭不肯上学,父亲递来一条毛巾,让他擦干眼泪,进而严肃告诫说:“人生就是要遇到无数难题,害怕退缩必将一事无成。”“赤脚少年”朱有勇下地干活,看到父亲辛勤劳作却时常遇到作物歉收,遂有了长大给土豆“治病”的念头。卢永根的父亲将“身劳苦学”“既买锄头又买书,田可耕分书可读,半为儒者半为农”的家训赠送给孩子。刘永坦的父亲跟他有一次正式谈话,沉痛诉说当时国家正在蒙受的劫难,期待他能“为国家干点正事”。彭士禄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之子,他4岁时,父亲英勇就义。但在彭士禄的成长经历中,父亲始终是不在场的在场。彭湃写下的“愿清天下苍生苦”的诗句,时常在彭士禄心中激荡。5位传主在父亲注视和期许的“目光”下长大成人,他们后来也成为父亲,接过赓续优良家风的接力棒。从美学象征上说,“父亲”是传统的象征,也是力量的象征。鲁迅先生1919年写过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,这声“请问”响彻百余年,时时引发世人思考。《愿将此生长报国》以传记形式,不经意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应。

《愿将此生长报国》书写了“一类人”,突出了科学家的“共性”,同时也呈现出他们丰富而饱满的“个性”。几位作者不拘而同从传主名字入手,来捕捉他们的个性。朱有勇在开拓事业的道路上“有勇”的一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,卢永根名字里的“根”,关联他与祖国的土地紧紧相连。写彭士禄则通过对照的写法展现出“科学大师”和“邻家大爷”在一个人身上如何“和谐共存”。

“共性”和“个性”的交融,使《愿将此生长报国》成为一本了解科学家精神与情感世界的书,它也是一本有价值、有风格、有营养的书。

王国平



《刀与木:我的版画之路》:

一个艺术家的编年史

杨先让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培养的第一代美术家。无论是从中国画到油画的转型,还是从版画到中国民间美术的跨越,他的艺术道路始终与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。《刀与木:我的版画之路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)以杨先让的版画艺术创作为主线,让读者沿着他的探索之路,回望一代艺术家的爱国情怀与艺术追求。

“每个艺术家都不能跨越时代,更不能摆脱时代的约束,个人的艺术实践必然离不开其时代的影响。”作者在该书《前言》中写道。上世纪50年代初,杨先让从油画转为新兴木刻版画创作,本能的艺术冲动和对时代的敏感,促使他创作了《延安组画》《鲁迅与〈可爱的中国〉》等写实作品。感动于石油队伍会师大庆草原的壮举,1975年,他创作木刻版画《会师大庆》,仅用10天便完成了这幅有数百人物造型、水印套色、恢弘大气的大幅版画作品,真实还原了建设大庆油田时热火朝天的场面。

创新求变是版画艺术的生命,从套色木刻起步到填补传统黑白木刻技术空白,杨先让将西方木刻刀法与中国传统雕版刀法融于一体。他不断探索新的版画形式和创作技法,题材

范围也不断扩大,如反映山区春景的《开春》、呈现敦煌艺术的《海底梦》、刻画长城景象的《凭吊》等,风格鲜明。当然,艺术家连同他所创作的作品,都不是孤立的,这些镌刻着时代变迁、生活嬗变、艺术流变的版画连缀在一起,汇成了一幅流动多姿的长卷,既是中国现代版画紧扣时代脉搏的缩影,也体现着艺术家扎根生活的创作追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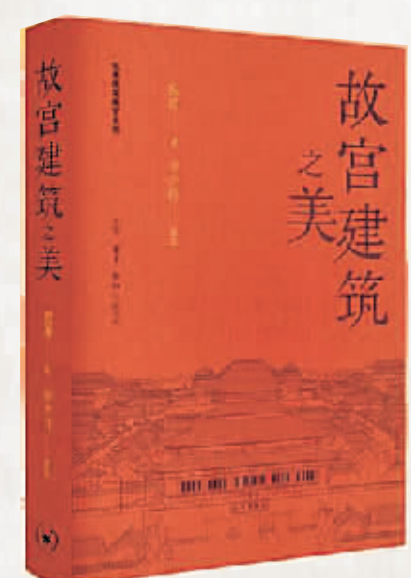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说杨先让艺术之路的第一个转折点,是从油画“阴差阳错”转到版画,那么,另一个转折点则是他暂时放下刻刀,转而投身中国民间艺术的挖掘与保护。这样的改变对一个视版画创作为生命的艺术家而言,需要极大勇气。其中固然有艺术道路的选择,更有出于社会责任的考量。杨先让在1983年出国探亲时,参观了许多艺术学校和博物馆,国外对原生态艺术的重视和吸收,使他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民间艺术是一大宝藏,“将会为中国艺术家提供无限的灵感,给予他们极大的启示。”他曾坦言,“民间美术不是我的梦想,但这是我的责任。”带着这份“执念”,他先是在中央美术学院创办国内首个民间美术系,讲授民间美术,后又于1987年到1989年,率领考察队历尽艰险出入黄河流域14次,潜心考察中国传统民间艺术,出版了考察成果《黄河十四走》,成为迄今为止黄河流域关于民间美术最为重要的考察实录之一。“让民间美术登堂入室,超越时空,滋润中华儿女的心灵”是杨先让的心声。在海外宣传中国民间艺术、笔述艺术界的新闻旧事,在国内外举办文化讲座……如今,94岁高龄的他虽然不再“以刀代笔”进行版画创作,却一直未停止对艺术的思考。

《刀与木:我的版画人生》里有作者用画笔书写岁月年轮的艺术人生,也有描摹各色人物、各式场景的版画。虽然我们每个人不可能都像杨先让一样成为一个艺术家,但我们却能像他一样,用心“雕刻”每一寸时光,成为生活的“艺术家”。

李钊



■新书 速递



《故宫建筑之美》:

以散文笔触讲历史

《故宫建筑之美》近日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,书中遴选了故宫中有代表性的建筑,以文化散文的笔触讲述了其历史渊源、建筑形制和审美功能,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、故事、历史变迁。

相较于历史学家严谨的历史叙事,作者祝勇所关心的,更多的是历史中人物的命运与生命体验。祝勇说:“我试图在文字里将这座早已建成的城重造一遍,材料不再是砖石、楠木、琉璃瓦,而

是文字。”在他的文字中,故宫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不再只是客观的存在物,总有历史与现实中的人与之息息相关。在祝勇看来,在这座宫殿中,明清共有24位帝王,唯有乾隆皇帝,为这座宫殿打上了最鲜明的个人标记,他修建的建福宫花园和宁寿宫花园,是六百年皇宫建筑中灵动活跃的部分。

因此,在谈到宁寿宫的倦勤斋对于乾隆皇帝的意义时,祝勇认为:“‘倦勤’,说明他累

了,要由‘公共’的乾隆,退回到‘个人’的乾隆。他要一个私密化的空间,摒弃政治的重压和礼制的烦琐,回归那个真实的自己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,“故宫摄影第一人”李小白所拍摄的图片与祝勇的文字似乎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书中的图片是李小白从自己数十年拍摄的故宫照片中遴选出来的,气象宏大,光影鲜丽,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。

路艳霞